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拉美地区一体化

——兼论巴西的区域大国定位

芦思姮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根据拉美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特征,该地区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发生转变,而该产品所释放的外溢效应对其供给行为者与供给结构亦产生了影响。巴西作为地区大国,现阶段而言,既没有足够的觉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主导这一进程的有效开展,原因是多重;该国尚需时日去构筑相应的责任意识 and 经济实力,进而在超国家层次上承担更多输出优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职责。

【关键词】公共产品;拉丁美洲;区域合作与一体化;霸权稳定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6)05-0011-07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ods ——With Additional Studies on Brazil's Role as a Regional Power

LU Si-heng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region has made a useful attempt to supply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this process, the demand preferences for public goods changed,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released by these goods also had an impact on its supply actors and supply structure. As a regional power, at this stage, Brazil has neither sufficient consciousness, nor sufficient capacity to lead a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cess for several reasons. The country should take time to build a correspondi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strength, and then should assume more duties to provide qualified regional public goods on a supranational level.

Key words: Public goods; Latin Americ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Hegemony stability

对于公共产品概念的论及,可追溯到古典学派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相关理论,而对其性质和供给问题的核心界定^①,则源自萨缪尔森——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1]。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探讨集团大小和成员数量对国际合作有效性影响时指出,一个集团的规模越大,所确定的公共产品数量越低于最优

水平,这是因为规模越大,各国采取集体行动所获得的收益份额越低^[2]。即参与国数量越多,每个国家所分得的利益越少。与此同时,协调数量众多且立场各异的成员国所耗费的成本却有所增加,这种情况造成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

根据这一逻辑,相对于国际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在某一区域内各国政府存在更大的激励形成共识。更确切地说,区域性制度规制以及地区协调

收稿日期:2016-06-11

作者简介:芦思姮(1987-),女,北京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拉美经济、区域一体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抗战略研究”(ZDA067)子项目“中拉整体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机制等公共产品能够以更有效率的形式产出。这是因为在有限的范围内,支付的成本更低而集体行动所获得的收益份额更高。此外,若地区公共产品在消费中产生正外部性,那么将会比国际公共产品更显著地抑制“搭便车”现象,如若产生负外部性,其影响范围也可受到地域限制,不至向更广范围扩散。

世界范围内,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践行区域一体化的地区组织仅有欧盟一家。而在其他地区,如北美、东亚等区域涉及的国家间关系大多停留在区域合作层面,未及一体化所达到的深度。拉丁美洲也不例外,一体化进程虽然亦尚属于摸索阶段,却从未停止过深化这一进程的脚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致力于从越发密切的安全防护、政治交往、经贸合作、社会保障中寻求以某种合适的互动方式,实践真正的一体化道路。

一、拉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迁轨迹

相较于欧美和东亚,拉美国家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意识源远流长,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而与之截然不同,对于将这种诉求付诸于实践,即形成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维持,拉美地区则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在拉美独立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国出于不同时期来自地区内外的需要,构筑了致力于密切各领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事实证明,无论这些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何种效用,其供给与维系均是出于对那一时代社会经济条件与诉求的反应。

(一) 玻利瓦尔主义时期

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时期的先驱者和领袖米兰达、圣·马丁,以及最负盛名的西蒙·玻利瓦尔,都曾构想组成一个拉丁美洲联盟,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民自由。在独立战争背景下,寻求拉美一体化的初衷主要在于“以联合争独立,以独立求富强”^[3]。革命者主张通过反殖民反霸权的国际合作,抵制一切外来干涉和国际殖民者与霸权国的相互勾结,以期在共同的身份认同下为和平与合作奠定基石。

在这种期许下,一系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区域和平的公共产品应运而生。例如:1819年,在玻利瓦尔的倡议下,新独立的委内瑞拉与格林纳达共同建立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这一联盟又先后同秘鲁、智利、墨西哥签订了“同盟条约”,旨在通过攻守

同盟捍卫独立成果。此外,1824年巴拿马大会召开,这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会上,多项合作机制设计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如制定联邦条约,为共同抵御外来统治与侵略提供制度性保障;根据军事协定,各成员国组建军队和联邦舰队,构建共同防务系统;设立仲裁机构协调各成员国关系,促进睦邻合作。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制度性文件最终没有被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批准。因此,这一建立区域政治安全合作与一体化的需求未能形成共识。

(二) 泛美主义时期

玻利瓦尔这一世纪性伟大构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美国政府加以利用。当时,基于将一切欧洲殖民势力排除在西半球之外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需要构筑一种理论主张和/或设计一种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从观念到实践层面上将拉美划入自身势力范围的目的。

基于此,在意识形态上“门罗主义”应运而生。美国将其与玻利瓦尔主义相提并论,称其为共同构成泛美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包含的“非殖民化、不干涉、不介入”³原则在地区范围内,甚至在全球产生了强烈的外部效应,催生了对抗衡欧洲殖民势力,共建一个美洲的广泛认同。但与此同时,在“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信条下,拉美主张独立自主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初衷,逐渐沦为美国称霸西半球战略的工具。

在组织机制上,“泛美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前身)的创建为这种理念付诸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4]。此后,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通过对拉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领域的渗透发挥作用,致使整个拉美一体化进程逐渐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拉美各国希望通过有效途径构筑地区一体化的强烈诉求被美国政府有意识地混淆并利用,从而使其成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牺牲品。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由美国一手主导和操纵的制度与组织机制产品,不仅使拉美地区很长时期内屈从于美国的政治意识与权力,也使经由该地区越发密切的经贸往来与一体化机制,形成了对美国的经济依附。

(三) 普雷维什主义时期

实际上,真正对玻利瓦尔一体化思想继承并发展的理论,是拉美本土经济理论——普雷维什主义。20世纪40、50年代,世界市场在先后经历了“一战”和1929年的大萧条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大幅降

低,使得当时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地区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萌生了探求发展模式失败原因、另谋发展道路的诉求。这一需求得到了阿根廷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理论回应。他在其著作中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衰落归咎于中心—外围不平等经济关系,这一论断为拉美地区实践新的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型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5]。

由此可看出,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诉求推动了新一轮发展理念和机制的供给。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供求关系并不只是单向的,供给要素也会反向地催生具有新时代特征的需求。具体而言,普雷维什主义主张欠发达国家应该开展立足于本地区的一体化合作,这样既能够通过形成广阔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效应以获得自身经济的发展,又得以打破“中心—外围”结构的束缚,摆脱对发达国家,或中心国家的社会经济依附。在这种思想的传播下,拉美各国意识到为了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需要在一体化实践中减少对域外国家的依附,需要通过区内经济联合与合作,寻求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

这种需求在拉美经委会出台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中均有明确反映,这些文件集中阐述了区域一体化原则、必要性和运行方式。在这一背景下,若干涉及不同层次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应运而生,如拉美一体化协会、拉美及加勒比经济体系、中美洲国家组织和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三国集团等等^[6]。尽管在这些区域性公共产品中,有些产品存在的时间短暂,有些产品发挥的影响不足,也有些产品作用的范围有限,但是这些机制安排不仅凸显了当时拉美地区希望加强区内成员国之间密切经贸联系、扩大区域贸易、深化经济一体化的意愿,也对当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各国建立工业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开放的地区主义时期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区域一体化趋势陷入了低潮与停滞。究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区域合作机制带有深刻的“封闭性”特征,各国主要采取以内向型市场合作作为推进一体化的主要模式,而对开放国内市场、参与国内竞争采取排斥态度^[7];很多制度安排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框架

下,深受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影响,运行变得封闭而低效^[8]。基于这些原因,改变这种封闭的、排外的内向型一体化模式变得必要而紧迫,因此拉美各国试图进行新一轮理论发展和制度安排,力求为一体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的提出,成为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趋势重新崛起的转折点。这一观念是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模式,向以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外向模式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其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9]。总体来说,这一理念设计的出台彰显了开放性,弱化了传统意义上区域一体化的排他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改变了以往局限封闭视角,重新焕发了区域合作机制活力的时代需求。在这种激励下,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逐步趋向将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结合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各国需要新的公共产品,用以应对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带来的挑战与竞争,以及满足各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展要求。因此,这一时期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鲜明的经贸偏向,其主要内容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对成员国经贸行为进行制度约束与利益协调,并向各个维度拓展,旨在实现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例如,安第斯共同体积极寻求与第三方开展自贸协定谈判,谈判对象既包括巴西、巴拿马这样的国家,也不乏南方共同市场这样的区域集团。供给模式从成员国的个体行动逐渐发展成为集团的集体行动,以期扩展现有合作与一体化经贸制度安排的范围,通过关税优惠措施加速区域经贸领域的自由开放改革进程。这种趋势体现在地区内各个次区域组织的行动上,除了安第斯共同体外,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等制度设计,同样凭借贸易投资促进协定获得了预期的成效。此外,对区域一体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在这一时期创建。南方共同市场一经建立,其所提供的一系列涉及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甚至社会文化领域的公共产品就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已经不再成为这一时期拉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导原因,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因素不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的是,21世纪以来,这种因素格外凸显了其在拉

美这片盛产政治思潮大地上的重要地位。随着大批拉美新左翼政府上台执政,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催生了以政治安全合作为基石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强势出现。

二、对拉美区域性公共产品特征的若干思考

(一) 区域性公共产品需求偏好

从上文对拉美地区公共产品供求轨迹的变迁来看,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区域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是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强大驱动力。自独立战争时期起,建立“拉美大家庭”的愿望就从未停歇,各国通过各种不同制度设计践行着这些思想。值得强调的是,两百余年来,推动这一地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所追求的区域公共产品效用偏好实现了从最初的区域民族安全、政治主权独立,到如今越发倾向于社会经济要素的转变。与此同时,这种诉求经历了从因受到外部冲击和影响而被动应对(如欧洲殖民侵略、美国霸权干涉),到基于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主动调整协调的过渡(如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变、为开放地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等)。

鉴于此,笔者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推动拉美地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往往出自政治安全考虑,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偏好大多向经贸合作领域倾斜,且效用范畴向多维度拓展。美洲开发银行在其报告中曾指出,区内国家对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处理跨境环境问题、跨国基础设施网络不足问题、跨越边界的疾病问题等,以及在不同的经济政策制定领域、推动研究网络的发展和建立区域性规制框架和标准,显得尤为重要”^[10]。

近年来,拉美各国更多地在寻求经贸投资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与此同时,鉴于政治安全类公共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不会随着时代变迁产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故始终维持在刚性水平上。当前对经贸层面的关注,说明拉美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大程度上处于区域合作层面;对于更深层次具有政治主权让渡色彩的一体化进程,仍属于初步探索阶段。区内国家寻求依凭各领域的经济合作促进广泛的政治认同与共识,即以经济合作机制为基础,为深化其后各领域的融合夯实基础,如基

础设施、金融股市、环境、扶贫、教育、医疗等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对基础设施产品的需求偏好越发强劲,鉴于其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笔者拟在下一部分具体讨论。

(二) 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外部性

从供给者角度来看,200年来,区域合作的制度设计构想先后由个人英雄(玻利瓦尔)、域外霸权国家(欧美国家)、国际机构(美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次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主导。可以看出,在供给者角色的转变过程中,拉美国家和地区组织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了地区的共荣,从被动承受第三方主导的公共产品,逐渐向主动尝试倡导一些区域性合作机制转变,这是因为这些行为体不仅逐渐意识到了通过区内联合,共同建立合作机制对推动地区社会经济整合的显著正向溢出,也亲身体验到了被霸权国家和国际机构操纵的一系列公共产品设计对自身利益产生的负向影响。

从供给领域角度来看,与需求如出一辙,实现了供给领域多样化的转变,尤其倾向于经贸领域合作机制的构建。值得一提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系统性复杂的公共产品,对这种机制的安排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外部效应,包括对区内国家间政治和安全的影响。以南共市为例,有观点认为,安全关系相对紧张的国家之间基于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需求,能够进行经济一体化合作。良好的区域合作关系利于成员国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在经贸上互通有无,在安全上磋商合作,从而能够增加政治上的互信以及相互依赖性。因此,区域一体化进程不仅能够促进成员国间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成员国之间安全关系的改善^[11],亦能够形成各国组建政治同盟的新动机。

(三) 区域性准公共产品

总体来讲,尽管近年来,随着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涉及不同领域的公共产品源源不断地产出,但其供给量仍然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社会经济需求,原因不仅在于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也归咎于许多组织机制在出台后并没有进行妥善的利益协调,故运行效率低下。抑或,是基于地区大国领导力缺乏,承担的公共责任不足的因素。关于这最后一点,笔者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解析。

对于拉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此应引入准公共产品概念。以基础设施为例^②,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交通成本每降低10个百分点,对拉美地区出口部门产生的积极效应就会达到降低关税同一比例产生效果的5倍^[12]。也就是说,这种准公共产品供给产生的积极外溢效应,不仅可以使相关国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规模 and 专业化程度促进其规模经济的产生,也有利于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提升物流效率,改善贸易便利化条件,缩短因距离造成的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地区市场的整合。此外,还将大幅提高货物、服务、人员、技术的流动性,使各国在低成本水平上密切经济往来,以期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大片内陆地区的闭塞面貌,使其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区域内的互联互通,为向世界敞开大门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和条件。

然而,对于拉美大陆的互联互通来说,这类关系民生的准公共产品供给尤为不足。如果一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尚且呈现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不足,那么区域内国家之间这类产品的共建实现便成为了问题。如何缓解基础设施供求关系日趋紧张的现状,是拉美地区各国今后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此外,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区域组织在制定供给这类产品的相关政策措施时,均应考虑“临界点”问题,即当供给量有限时,应对到达“拥挤点”后消费每单位产品增加的边际成本所引起的社会负面效用,进行充分预期。

三、巴西在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评析

罗伯特·吉尔平曾在阐述霸权稳定论时探讨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金融占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应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以获取其他国家对霸权国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的繁荣和稳定^[13]。

那么,若将这一视角自国际层面缩小至区域范围,即在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一个地区大国或霸权国家的出现是如何引导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的呢?笔者认为,这种领导力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要素^[14],二者缺一不可:一是大国有觉悟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做出暂时牺牲现时短期利益的行为,以促

成或维持整个区域长远利益的共享;二是有能力不断地凭借一己之力输送有效的制度产品,或者有能力组织各成员国的谈判及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利益矛盾。然而,这两种职能的实现并不是一件易事。地区大国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成本与和收益之间往往存在时滞,从而为区域一体化与合作中成果的取得增添了不确定性。再者,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关切在于选举制度的实施,各国政府为了获取更多选票,以帮助所在政党获胜,不得不侧重于那些立竿见影的短期经济社会成效。相比之下,为谋求国家长远利益的现期成本支付,显然对于赢得激烈的选票之争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此外,在政府治理中,亦缺乏为国家谋求长远利益的激励性机制。

因经济存量及发展规模在地区范围内举足轻重,巴西一直致力于成为拉美尤其是南美地区的大国与强国^[15],但就现阶段而言,它既没有足够的觉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践行深化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领导力。原因是多重的:

一是政治因素。如上文所述,这种领导力的实现需要国内各方政治势力达成共识,而巴西国内政治力量林立,利益诉求错综复杂,因此政府做出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决策,往往会遭遇到国内选举环境的约束和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

二是经济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巴西对于短期利益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实现更为看重,尚需时日培养其作为地区大国的责任意识。况且,实施领导力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支付不小的成本,受限于其现有的社会经济实力,即使政府有了这种觉悟,该国也无力将这一领导作用付诸实践。特别是近两年来,基于国际大宗商品不景气和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疲弱,以及国内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利局面,巴西经济已经深陷技术性衰退,呈现负增长^[16]。在自顾不暇的形势下,如何为增长同样乏力的拉美各国注入新的区域性制度安排,以激发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对于巴西,显然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三是贸易因素。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并不高。以区域内出口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例,拉美区内国家贸易依存度未及20%,南共市更是低于这一平均值,远低于北美自贸区和东盟将近50%的水平^[17]。因此,相比促成与域外

主要贸易伙伴,如与欧盟、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巴西一定程度上缺乏激励去推动本土一体化进程。

四是文化因素。劳伦斯·哈利森曾指出,拉美文化的特点是“反劳动”却注重体面,尤其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甘愿牺牲未来^[18]。这一观点既能说明巴西政府更为看重短期利益的文化根源,又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巴西政府对于树立地区大国的心理:既希望获取并享受主导地区一体化的大国虚名,又不希望为达到这一目的付出必要的努力、承担必须的责任。

笔者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美地区最重要的一体化成果——南共市为例,考察巴西作为地区大国,对这一机制中公共产品供给职能的实现状况。

事实上,南共市这一区域经贸安排是一种不完全的关税同盟,最初由5个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家组成。需要指出的是,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或者规模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些国家在经贸领域产生不同诉求的原因。尽管如此,这种各方需求的不平衡性也未必能构成一体化组织整合市场和利益合作的障碍。如果能够针对这种差异性,构建一种对权力、利益、资源、需求分配的激励机制,那么这种一体化与合作体系非但不会使成员国之间渐行渐远,还会令各国之间因关联性依托各种利益权衡与调节的动态平衡变得更加紧密。然而,南共市恰恰缺乏这种机制,即无法在组织框架内形成一个使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动态均衡点。我们知道,对于双边合作的促成,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在这种非合作博弈中,个人理性优于集体理性,双方不合作是其纳什均衡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由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促成合作共赢的公共产品——一份共同的、有效的激励机制。这样,通过共享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法规中的奖惩措施,既可以增进各方合作的收益,也可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提高各方不合作的成本。

就关税同盟而言,共同对外关税的制定正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众所周知,南共市的对外关税较高,带有保护主义倾向,这是出于集团内部巴西和阿根廷国内生产结构的需要。具体而言,是为了保护本国日渐衰退的工业体系,而集团中较小规模的乌拉圭、巴拉圭等国,生产结构不如巴西、阿根廷多样^[19],因此在关税同盟成立后,这两个小国贸易转移效应更加明显,所遭受的福利损失更加严重。正

所谓当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悬殊时,内部贸易合作所获取的利益便会更偏向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而欠发达国家则难以获得同等报偿。这是区域内部产生矛盾的重要因素^[20]。实际上,在商议制定统一对外关税时,为了协调各方利益,作为地区大国,巴西应该肩负起相应责任,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需要强调的是,区域一体化进程所蕴含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例如体现在关税问题上,若巴西按照自身意愿制定了高关税,就应该构建相应的机制为因经济结构相对落后而遭受更多损失的小国进行补偿,以通过平衡利益分配实现国家平等。这种赔偿机制的运作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采用最直接的方式,即单方面的转移支付,或是为受损国提供一些非关税的优惠待遇,如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方面,进而为小国进入高关税受惠国的国内市场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对此,巴西也曾进行过相关的努力与尝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6年南共市结构一体化基金的设立。这是巴西主导的第一个旨在降低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不平衡性的利益分配补偿机制^[21],但最终由于资金短缺,资金投入量远低于维持机制运行所必需支付的成本,因此这一机制数年来依旧收效甚微,乌拉圭、巴拉圭等国由于长期无法获得足够的利益补偿,故对集团过高的对外关税怨声载道。

若将范围从南共市扩展至整个拉美地区,巴西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共同发展方面同样进行了一些尝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产品的供给上。2000年,巴西积极推动“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这一由地区12个国家组成的机制,旨在实现地区交通、能源、通信一体化目标。该倡议以交通基础设施为重点,这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边界效应则越低^[22],从而对促进区域内国家间贸易,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正向外溢影响。然而,与高关税的补偿机制如出一辙,这一基础设施供给同样长期受制于资金少、协调难等瓶颈,故难有更大作为。所有这些问题,均深刻反映出巴西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领导力的缺失。

结论

在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呈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需求与

日俱增,从而催生出区内一系列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些产品所释放出的外部性,对深化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进程又反向刺激了对数量更多、质量更高、范围更广的公共产品需求的形成。随着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不同领域的公共产品虽然在源源不断地产出,但供给量仍然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社会经济需求。尤其是对基础设施这样的准公共产品而言,这类产品对整合区域市场,缩短各国社会经济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正向外溢效应。

从动因上看,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外部冲击,到主动适应内部发展要求这一转变;从偏好上看,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正逐渐从政治安全考虑向经贸合作领域倾斜,成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因素交织,并日益融入社会文化发展要素的过程。而从这一进程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看,拉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仍以区域合作层面居多,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层面尚属摸索阶段,各国对自身主权让渡的程度和范围依然有限。

作为地区大国与强国,巴西一直希望能够在推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中有所作为。但是,现阶段而言该国既没有足够的觉悟,也没有足够的去引导这一进程的有效推进,其原因涉及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整个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框架内,地区大国政府应该在超国家层面上承担更多的职责,即在一体化平等自愿原则下,为促成区域内各行为体采取集体行动而支付更多的成本,并将公共产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合理分配给区内各国共享。如此,才会促使拉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持续地深化与推进。

注释

- ① 公共产品这一概念是私人物品的对称,包含两个特性:一,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物品的“谁支付谁使用”原则,由于成本高昂或技术上不可行等因素,无论支付者还是非支付者,均可“消费”,即无法排除其他人参与享用该物品的特性,是谓非排他性;二,在消费过程中,由于消费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增加额外消费者并不会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产品的数量,或降低其他人享用该产品的质量,即将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的特性,是谓非竞争性。此外,仍需指出的是,对这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会产生外溢效应,这会导致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或个人效用和社会效用之间产生偏差。
- ②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的程度,一般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其中准公共产品,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之间,亦称“有限的公共物品”,其主要特征是在这种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个“拥挤点”,到达这一临界点之前,消费的边际成本近似为零,而当超出这一点后,增加额外消费人数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直到达到这一产品所能容纳的最高数量,此时边际拥挤成本趋于无穷大。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与私人部门皆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一系列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如交通道路系统、港口、供水系统、电力能源系统、信息通讯系统、教育、文娱、医疗保健、邮政服务等。

参考文献

- [1] Samuelson Paul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4): 387-389.
- [2] Olson Mancur.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1, 25(4): 866-874.
- [3] 洪国起. 玻利瓦尔主义与拉丁美洲一体化 [J]. 南开学报, 1999(5): 133.
- [4] 王晓德. 从“门罗宣言”到“泛美联盟” [J]. 历史学习, 2010(3): 5.
- [5] 曹因. 拉美发展主义理论简述——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 [J]. 社会观察, 2004(5): 44-45.
- [6] 沈安. 从经济一体化走向政治经济联盟——拉美团结自斗争争取独立的历史道路 [J]. 拉丁美洲研究, 2011(1): 25-29.
- [7] 王新禄. 拉丁美洲一体化现状、成果和前景 [J]. 拉丁美洲研究, 1998(1): 33.
- [8] 徐宝华. 拉丁美洲国家的改革与地区一体化重振 [J]. 拉丁美洲研究, 1998(1): 38.
- [9] 王晓德. “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0(5): 54.
- [10] Estevadeordal, Antoni, Brian Frantz, Tam Robert Nguyen. Regional Public Good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M]. IDB Publications Section 2003: 60.
- [11] 周宝根. 经济一体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以南方共同市场为例 [J]. 太平洋学报, 2010(1): 67.
- [12] García, Enrique. Infraestructura e Integ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J]. Boletín Económico del ICE, 2009, 2974: 27-42.
- [13] 转引自樊勇明. 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理论观点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1): 7-13.
- [14] Caetano, Gerardo (coord.). Mercosur 20 años [Z]. Centro de Formación para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CEFIR), 2011: 82-83.

(下转第30页)

- [6] 阿图赛. 自我批评论文集 [M]. 杜章智, 沈起予, 译.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0: 81.
- [7]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 The Detour of Theory* [M]. Brill, 2006: 23.
- [8] 阿尔都塞. 来日方长 [M]. 蔡鸿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82.
- [9]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43.
- [10] 阿尔都塞. 来日方长 [M]. 蔡鸿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46.
- [11]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64.
- [12]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 [M]. 顾良, 译. 商务印刷馆, 2006: 12.
- [13]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69.
- [14]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76.
- [15]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77.
- [16]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80.
- [17]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M]. 陈越, 编.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90.
- [18] 保罗·托马斯, 著.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 [M]. 王远河, 王克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211.

—————
 (上接第 17 页)

- [15] Santos Sergio Caballero. Brasil y la Región: una potencia emergente y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sudaamericana [J].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2011, 54 (2): 158 – 172.
- [16] Cepal, B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Z]. 2015: 7.
- [17] Cepal.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el Mercosur hacia la convergencia en la diversidad [Z]. Naciones Unidas, noviembre de 2014: 21 – 42.
- [18] Harrison, Lawrence.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165.
- [19] Porta, Fernando. La Integración sudamericana en perspectiva. Problemas y dilemas [Z]. Cepal, septiembre de 2008: 12 – 19.
- [20] 方幼封. 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就和问题 [J]. *拉丁美洲研究*, 1995(1): 36 – 41.
- [21] 南共市官方网站. http://www.mercosur.int/innovaportal/v/385/2/innova.front/fondo_para_la_convergencia_estructural_del_mercosur_focem [EB/OL]. 2015 – 11 – 22.
- [22] 刘生龙, 胡鞍钢.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 [J]. *经济研究*, 2011(3): 72.